

第四部

新的繁盛

(1972—1988)

日本漢學史

(修訂本)

● 李 庆 著

清園



第四部

新的繁盛

(1972—1988)

日本漢學史

(修訂本)

● 李 庆 著

清園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四部说明

这是拙著《日本汉学史》的第四部。

《日本汉学史》全书共五部。前三部：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三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曾从2002年开始，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第四部记述的是从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汉学的历史。第五部《变迁和展望》(1989—)。今全部五部经修订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的70—8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恢复后的这20多年间，或可以称为中日关系历史上的“蜜月”时期。

这也是日本汉学(Sinology)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转折，以日本社会的“中国热”为契机，在各个领域中原来多年累积、蕴藏着的能量一下子都喷发出来的时期，形成了非常绚丽多彩的场面。内容之充实，形式之多样，见解之深刻，涌现出可以说和任何一个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的丰硕成果。这是一个收获的时期，是一个展现出新的兴盛的时期。

关于本书中“汉学”这一概念的界定，笔者已经在本书第一部，全书的《前言》中作了说明。为了免读者翻检，在此再简要地说明一下。本书所说的“汉学”，是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词语，它不是日语中的汉字词语“汉学”。这两个词语虽然都用同样的汉字组成，但是，汉语的“汉学”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意义——英语“Sinology”的汉译(当然还有其他意义，在此不论)，和日语的“汉学”一词在日文语境中的主要含义——传统的以中国儒学为主体的学问，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个词语，当然还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可以另行讨论。我并不期待人们都赞同我的定义——学术研究中的定义有时是很难一致的。我要强调的是，本书所用的“汉学”，是中文词语的“汉学”。要之，是指日本自明治维新(1867年)以后，吸收了近代西方的研究方法，接受了西方汉学(Sinology)的影响，用和传统不同的理论、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清末以前的文化：思想、宗教、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等)研究的学问。这是和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如中国历史上的汉、宋之学的“汉学”)，或日本历史上的专指以儒学为主的“汉学”(或“汉文学”式的“汉学”)在内涵上有所不同的概念。

在这一个时期,由于中国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动荡和闭锁,又打开了国门,面向世界。在世界上,涌现出了一股新的“中国热”。

在这一部中,由于研究的态势有所变化(比如,原来作为“中心”地位的大学,霸主或宗主的地位渐渐丧失。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达,各种专门学会的出现,各个领域都自成体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笔者的写法也自然要随之而变——形式总要受制于内容。也就是说,不再以个人或区域划分,而基本采取以学科为系统的方法。并尽可能在每一个部分,简单地归纳一下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概况。这或可以使读者感受到日本学术界变化发展的脉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部以及第五部和前面三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四、第五部的写作上,也有一些地方和前面几部稍有不同之处。比如,在前面几部,特别是第一、第二部中,由于在1934年以前,日本的有关文献资料库缺乏,许多文献目录都没有很好地整理,所以笔者在按照年代编排有关目录,以呈现研究的概貌,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是到这两部所写的时代,日本学界对有关基础文献目录,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整理,著名的《东方学文献类目》以外,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有了自己的数据库。因此,笔者就把力量更多地放到了主要代表性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介绍上。

丰富的材料和严谨的考证,是文史研究的基础。这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话,一些朋友曾视此说为冬烘之见。不过,我仍然坚持这一点。在这一部中,和其他各部一样,我依然对每个部分的每个人物的有关资料,作了收罗考察。但这样做,绝非不重视理论分析,恰恰相反,只有深邃的理论之光,才能在纷然驳杂的资料丛林中,指出我们前进的方向。笔者在各部分的论述中,自然也在这方面加以重视。

笔者非常明白,这里所论说的当然无法囊括这一时期日本汉学研究的全部细节。各个领域专门的研究状况,还需要专门的著作去阐述。笔者尽量把各个领域主要的代表性学者的情况做一些展开式的叙述。读者如果从这里论说的学者或研究情况出发,由此及彼地推展开去,相信可以比较方便地把握整个学术领域的流变,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目标。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封闭的。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文化就更加密切相关。不了解这种联系,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这数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无法解释其中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中国文化的研究,必须要面向世界,这是笔者撰写此书的初衷,而在十多年的写作研究过程中,越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2000年10月

2003年秋—2004年初改

目 录

第四部说明	1
第七编 中日关系新时期的汉学兴盛(1972—1988)	1
第一章 变化着的世界政治经济构图	1
第一节 朝多元化变动的国际环境	1
第二节 日本的国内形势和中日关系	3
第二章 国际汉学和日本与国际汉学的密切联系	8
第一节 各国汉学研究概述	8
第二节 日本与国际汉学的密切联系	28
第三章 日本汉学概况	38
第一节 日本汉学研究的社会组织概况	38
第二节 这一时期日本汉学的特点	46
第四章 史学研究概况	52
第一节 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	52
第二节 先秦春秋战国史研究	60
第三节 秦汉史研究	67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80
第五节 唐、五代史研究	90
第六节 宋辽金元史研究	103
第七节 明清史研究	119
第五章 代表性的史学研究学者	134
第一节 考古研究者	
(樋口隆康、伊藤道治、林巳奈夫、关野雄、三宅俊成、 松崎寿和、冈崎敬等)	134
第二节 秦汉史研究者(之一)	

	(增渊龙夫、五井直弘、栗原朋信、古贺登、好并隆司、 小仓芳彦〈见思想史〉)	150
第三节	秦汉史研究者(之二)	
	(大庭修、永田英正、狩野直禎、米田贤次郎、影山刚等)	163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者(之一)	
	(宫川尚志、越智重明、西村元佑、崛敏一、 大川富士夫、冈崎敬〈见考古〉等)	177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者(之二)	
	(栗原益男、布目潮汎、谷川道雄、菊池英夫、 藤枝晃〈见历史地理〉)	194
第六节	宋代史研究者	
	(柳田节子、斯波义信、河上光一、长瀬守、竺沙雅章等)	207
第七节	辽金元史研究者	
	(村上正二、佐口透、萩原淳平、丹羽友三郎)	220
第八节	明代史研究者	
	(山根幸夫、岩见宏、小山正明、佐久间重男、 谷光隆、小野和子、间野潜龙)	226
第九节	清代史研究者(附:近代史研究者)	
	(神田信夫、松村润、植木野宣、小竹文夫、重田德等)	245
第十节	历史地理、边疆地理和中外交流史研究者	
	(日比野丈夫、榎一雄、藤枝晃、护雅夫、佐藤长、山田信夫、 山本达郎、石原道博、佐藤三郎等)	264
第十一节	科学技术史研究者	
	(能田忠亮、藪内清、山田庆儿、鲇泽信太郎〈见地理学史〉、 冈西为人〈见医学史〉、笈田统〈见食品史〉)	289
第十二节	其他自然科学专史研究者	
	(鲇泽信太郎、冈西为人、森田传一郎、笈田统、佐藤武敏、 吉田光邦等)	309
第六章	思想和宗教领域的研究	322

第一节	思想、宗教领域汉学研究概况	322
第二节	先秦两汉思想研究者 (金谷治、本田济、小仓芳彦、小野泽精一、日原利国、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楠山春树〈见宗教〉等)	342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研究者 (福永光司)	368
第四节	宋明理学研究者 (山井涌、荒木见悟、山下龙二、山根三芳、佐藤仁)	378
第五节	前近代思想研究者 (后藤基已、汤浅幸孙、岛田虔次、高田淳)	390
第六节	佛教研究者 (中村元、古田绍钦、高崎直道、关口真大、柳田圣山、镰田茂雄、 阿部肇一、竺沙雅章〈见史学〉等)	403
第七节	道教研究者 (窪德忠、楠山春树、秋月观瑛、宫川尚志〈见史学〉等)	427
第七章	文学研究	439
第一节	文学研究概况	439
第二节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者 (前野直彬、村山吉广、竹治贞夫、御手洗胜、铁井庆纪等)	450
第三节	魏晋六朝文学研究者 (小尾郊一、古田敬一、冈村繁、伊藤正文、一海知义、 铃木修次等)	470
第四节	唐宋文学研究者 (清水茂、黑川洋一、荒井健、冈村贞雄、村上哲见、田中克己等)	495
第五节	元明清文学研究者(之一,戏曲) (田中谦二、岩城秀夫等)	517
第六节	元明清文学研究者(之二,诗文) (横田辉俊、近藤光男、佐藤一郎等)	528
第七节	小说研究者	

(志村良治、竹田晃、内山知也、庄司格一、伊藤漱平等)	539
第八章 语言和艺术等的研究	558
第一节 中国古代语言研究	
(桥本万太郎、牛岛德次、尾崎雄二郎等)	558
第二节 中国美术史研究	
(铃木敬、小杉一雄、田中一松等)	573
第三节 中国书法史研究	
(伏见冲敬)	582
第四节 文献学研究(附: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专史研究)	
(阿部隆一、水泽利忠、仓田淳之助)	588
第七编结束语	601
正文索引	603

第七编 中日关系新时期的汉学兴盛 (1972—1988)

第一章 变化着的世界政治经济构图

第一节 朝多元化变动的国际环境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东西两极对立的政治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的复苏,法国戴高乐主义提倡,使西方阵营出现了分化的迹象。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的对立,东方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五六十年代勃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烈火,依然在熊熊燃烧。世界的格局在变动中朝着多元化的方面展开。

急于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解脱的美国,和面对苏联的威胁,逐步从“文革”中走出、在美苏两大霸权之间纵横捭阖的中国,急速地接近。

1972 年 2 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沟通开始正常化。

同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恢复邦交。世界的政治格局在 70 年代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世界并不安宁。

美国,在世界外交上频频得分的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在国内却日益陷入困境,最后于 1974 年 8 月,被迫离开了白宫。

美国的经济状况,日见恶化。1977 年 6、7 月,卡特总统任内,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现实的经济要求,使美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从国际转向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潮抬头。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 17 年中,一方面把大量的经济力量投入到军工方面,使

苏联成为在军事上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在国内实行保守政治,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未能得到明显的改善,社会矛盾日见尖锐。

1983年,勃列日涅夫死去,经过两年左右的过渡交替,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提出了“新思维”的见解,开始了新的一波改革。而这样的“改革”导致了苏联最后的解体。

欧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开始摸索统一的道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80年代末,才开始看到了统一的可能性。

在中近东,1973年,就在延续了八年的越南战争签署了和平协定后不到一年之时,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以往的三次不同,这次是由阿拉伯国家首先发动的攻击,最后虽说阿拉伯国家仍处于不利的状况,但并没有像以前三次那样遭到明显的失败。

战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正式动用手中的石油能源武器,宣布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并以此向美国、日本等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调整在中东的政策。在全世界引发了所谓的“石油危机”。而在这一过程中,美、英、法和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明显化。

除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对立战争以外,1979年,伊朗的“宗教革命”成功,推动伊朗“现代化”的布列维国王流亡国外,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国内。接着,伊朗和美国断交。

1980年,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以后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

在南亚和远东,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结果是巴基斯坦解体。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

在非洲和南美洲,在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中成立的新兴国家内,因部族和阶级的矛盾,经济发展问题,又发生了新的激烈纷争。

在这世界动荡变化的环境中,亚洲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地区,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被称为“四小龙”。同时,“东盟”(ASEAN)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也一步步地壮大起来。

这一时期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恐怕要算中国了。

1976年,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接着,“四人帮”倒台。中国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但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和中国社会上,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社会如何发展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不断地在进行。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由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开始全面推行。

1979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

1984年,英国撒切尔首相访华,和中国签署了决定归还香港主权的协议。

198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海峡两岸的关系松动。同时又蕴藏着新的不安因素。

世界在多元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的交互作用中,在战争、缓和、改革、发展的交替变化中,朝着社会进步和结束冷战的方向变动着。

第二节 日本的国内形势和中日关系

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国内政治和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经过了战后的复苏,日本在70—8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崛起,超越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汽车、家电、计算机等高精尖产品,行销全球。日本金融的触角,伸向整个世界。在这样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日本的社会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战后的日本,一个最基本的趋向就是要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阴影,重新恢复自己国家的形象。

政治上,坚定地追随美国,恪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同时,逐步表现出对于美国相对的独立性。60年代末出现的所谓“国际化”倾向,就是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输出的竞争力增强和国际收支黑字的增多而面临的追求进一步发展的选择。(参见日本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编《国际化中的日本》19页,青木书店,1987年)

1968年日本官方的《经济白皮书》,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国际化”的问题。(见中岛克己、桑田优编《日本国际化的思考》51页,ミネルヴァ书房,1992年)此后,尽管国际环境不断变化,但日本政府一直采取着这一方针。支持日本的企业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大舞台。

1972年,冲绳群岛由美国归还给日本。佐藤荣作内阁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代之而

起的,是在“角福战争”(庆按:“角福”,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中脱颖而出的田中角荣内阁。

田中角荣提出了著名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同时,他采取了日本独立性较强的外交政策,中日邦交的恢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

1972年,田中角荣以其决断力,解决日本战后最大的外交悬案,实现了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但1974年公开化的“洛克希德事件”,迫使田中内阁下台。究其深层的原因,或许有着美国对于他这种过分“独立”倾向的不满。

此后,虽说政府和财界的勾结,政界的腐败现象不断被揭露。特别是1988年的“利库路特”事件,暴露了政界的深度腐败,但直到90年代细川内阁为止,日本政权始终掌握在自民党手中。就其政治态势而言,基本没有大的变动。

在这期间,经济问题越来越成为日本政治家关注的中心。

1973年3月,战后以美元作为国际通货的金融体制实际上崩溃,代之以各国货币的兑换变动体制。(参见香西泰《高度成长的时代》,日本评论社)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挥动石油武器,造成日本战后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次石油冲击,在政治上,迫使日本的政治家在中东采取和美国多少有些差距的政策。而在日本国内,实际上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浪潮,使之进入一个较平稳的调整阶段。日本的经济开始朝情报化的方向调整。

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和它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加剧。日美之间的贸易战争,如围绕着牛肉、橘子、汽车的输出入问题的纠纷,连续不断,最后是在美国的压力下的日圆升值。

1949年1美元=360;1981年1美元=201;1987年1美元=148;1989年1美元=120。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盛的同时,也给日本产品的输出造成了相当的压力。

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日本的经济到达了新的转换点。出现了铁路等大公司的民营化,财政重建的新动向。

在日本国内,由于经济的发展,公害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日见明显,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意识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化”的趋势显得越发强劲。“国际化”成为日

本社会注目的话题之一。

1984年,日本经济协力开发机构发表题为《积极的调整政策》的文件,对国内经济机构的转换政策,提出看法。

1986年4月,发表了《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构造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又称《前川报告》),对日本的经济现状和面貌的问题,进行了较具体的分析。

不仅官方,民间,财界也积极投入。1986年,发表的《日本银行证券会社的国际竞争能力》(奥村宏作,《中央公论》1986年7月号)就是这一动向的反映。

此后,1988年全国各地30个机构,对地域性进一步的“国际化”,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发表了专门的研究报告。(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国际化和地域社会》)

日本的“国际化”浪潮,推向了各个层次和地区。

再来看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

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路平坦。

中日邦交恢复后的首先的实务问题就是缔结航空和航海协定。1973年3月开始的航空协定谈判,遭到了自民党内和日本财界一部分及在中国台湾地区有实际利益关系势力的反对。他们结成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其中的部分中青年议员,更组成“青岚会”,进行活动。经过当时大平正芳外相的访中,到1974年4月,才在中日双方的努力下,达成协议,9月29日,实现了中日的通航。

该年11月,缔结中日友好条约的交涉开始进行。由于田中内阁因“洛克希德事件”下台,三木武夫内阁成立。在日本国内反对势力的抵抗下,中日友好条约的谈判围绕着所谓“反霸权”条款的认识,再加上和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搁浅不前。此后,由于中日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友好条约的缔结就搁置了下来。到1978年,才最后签订。

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尤其是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9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占了主导地位。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11届6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方针路线进行了总结。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放。

在此期间,中日两国间的社会、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具体表现在:

政府层面,两国首脑频繁互访。1979年12月日本首相访问中国。1980年5月中

国总理访问日本。1982年5月中国总理访问日本。1982年9月,日本首相访问中国。198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访日,提出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1984年,1986年,日本中曾根首相两次访华。1988年日本竹下登首相访华。这样的互访,加深了两国领导层的相互了解。

社会层面,民众的联系在加强。据统计:1970年,日本访问中国的人数为1400人次。从中国到日本的人次仅139人。到1980年,日本前往中国的人次约为60000人。从中国到日本的人次约为15000人。(古川万太郎《战后日中关系史》396页)

此后,1984年秋,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1986年后,以日本“国际化”和招收10万留学生的计划为契机,大量的中国留学或就学生来到日本。

从经济上看:1972年恢复邦交时,日本对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亿美元,到1980年,达到100亿美元。1985年,更达到190亿美元。(同上书,433页)

1979年12月开始的日本政府对中国经济建设贷款(日圆贷款),包括1988年2月决定的贷款,一共有三次(第一次,1979年到1983年3309亿日圆。第二次1984年到1990年,5700亿日圆(包括1987年追加的1000亿日圆)。第三次1990年到1995年,6000亿日圆),成为中日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这一段时期,在关系发展的同时,也有许多问题不断发生。前面提到的友好条约缔结时的纠葛是其一。

此后1979—1980年,因中国国内经济的调整,在和日本贸易协定的履行上,发生矛盾。

1982年6月围绕着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检定”,也就是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是侵略还是所谓的“进出”问题,发展成中国和日本政府间的外交事件。

1985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日本和中国、亚洲各国的批判和反对。这个问题一直像幽灵一样,在中日关系中徘徊。

1987年2月,对京都“光华寮”的所有权的裁判,再次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外交纠纷。

但相对而言,这一时期,是中日之间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由于当时整个世界仍处于冷战结构中,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轴的日本外交政策,处在美国对中国关系的制约下;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恢复邦交,整个日本社会中,对中国友好和感谢(主要是中国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款)的气氛占了主要地位,所以,表现出相当友好的状况。但同

时,也有着上述的矛盾和纠纷。

这些纠纷和矛盾,从根本上说,实际上就是如何认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这一历史问题,如何面对目前中国实际处于未统一状态的现实政治问题。如何对待正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仍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后渐渐浮现出来。

不管怎么说,中日两国之间要求友好和交往,反对侵略战争,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主流。

第二章 国际汉学和日本与国际汉学的密切联系

第一节 各国汉学研究概述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世界各国汉学研究的情况又如何呢?

由于1971年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改变,使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的学术领域,出现了“中国热”,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新的开展。

这一时期世界上的中国文化研究,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转到了美国。

我们在上一部中介绍的那些代表性的汉学家,有的依然在世界舞台上活跃,发挥着作用,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的学者。下面作为日本汉学展开的背景,对国际上主要国家的汉学状况,主要是和日本汉学有关的组织、刊物、学者,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一、美国研究概况

1970年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过去以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界的批评,出现了强调“以中国为中心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动向。(见李荣泰等译,《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四章,台湾经联出版社,1991年)而随着“中国热”的涌现,汉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当多的新成果。

(一) 研究组织和机构

上一部中已经介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机构和学会有: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成立,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学会。

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1941年成立,是最大的亚洲研究组织。在安阿伯密执安大学。

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年成立,虽说不是专门对东亚的研究组织,然而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学术组织。在华盛顿。

亚洲学会(Asia Society),在纽约。1956年成立。

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ultural and Technical Inter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设在夏威夷,实际是美国官方的一个教育研究机构。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研究热的出现,在全国性的组织之外,各地区、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出现了有关中国的研究组织。主要的大学有: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斯坦福、加利福尼亚、芝加哥、康奈尔、佛罗里达、印第安纳、密执安、明尼苏达、夏威夷等。这些大学都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图书馆,收藏有中文图书的图书馆,除了国会图书馆系统以外,还有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藏有中文图书的图书馆达到67个。

(二) 专业的研究杂志

笔者所知,主要的有: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亚洲研究杂志》。1941年在费正清等青年学者的倡导下,成立“远东协会”。出版《远东季刊》。1948年4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成立了“远东协会”。1956年改名为“亚洲研究学会”。《远东季刊》也改名《亚洲研究杂志》。

《中国宗教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JAS)。

《宗教史》(HR),芝加哥大学主办。

《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 Studies)。

《道教资料》(Taoist Resources),原曾在夏威夷大学,1988年编辑部移至印第安纳大学的布卢明顿(Bloomington)。

《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夏威夷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主办。

(三) 主要学者

这一时期,除了在上部中介绍的费正清、李文逊(一作列文森)、狄百瑞、墨子刻等汉学家仍然有相当的影响外,还涌现出了不少新的学者。而不少老的研究者也发表了新的成果。